

主编 寇艾伦 (Allen Carlson)
高 敏 (Mary E. Gallagher)
李侃如 (Kenneth Lieberthal)
墨 宁 (Melanie Manion)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新材料、新方法和实地调查的新途径

New Sources, Methods, and Field Strategies

许安结 赵明昊 张 勇 等译
段若石 胡国成 赵 梅 审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主编 寇艾伦 (Allen Carlson)
高 敏 (Mary E. Gallagher)
李侃如 (Kenneth Lieberthal)
墨 宁 (Melanie Manion)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新材料、新方法和实地调查的新途径

New Sources, Methods and Field Strategies

许安结 赵明昊 张 勇 等译
段若石 胡国成 赵 梅 审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新材料、新方法和实地调查的新途径 / 寇艾伦等主编,
许安结等译, 段若石等审校.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161-4855-6

I. ①当… II. ①寇…②许…③段… III. ①政治-中国-现代-文集

IV. ①D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257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夏 侠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2
字 数 327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寇艾伦 (Allen Carlson): 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陈 鹏 (Calvin Chen): 美国曼荷莲学院 (Mount Holyoke College) 政治学副教授

曦 中 (Xi Chen):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狄忠浦 (Bruce J. Dickson):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

段 宏 (Hong Duan): 美国康奈尔大学政府系博士候选人。

高 敏 (Mary E. Gallagher): 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葛小伟 (Peter Hays Gries):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美中问题研究所主任、副教授, 哈罗德·J. 和卢斯·纽曼美中问题讲席

贺 斌 (William Hurst):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助理教授

李 磊 (Pierre F. Landry): 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李侃如 (Kenneth Lieberthal):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全球经济发展资深研究员,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刘明兴 (Mingxing Liu):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员

墨 宁 (Melanie Manion):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与公共事务教授

芮杰明 (Benjamin L. Read): 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政治学系助理教授

单 伟 (Wei Shan): 美国杜克大学博士后

沈明明 (Mingming Shen):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史宗瀚 (Victor Shih): 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

施达妮 (Daniela Stockmann): 美国莱顿大学 (Leiden University) 政治学
助理教授

杨 明 (Ming Yang): 北京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文版序言

李侃如 (Kenneth Lieberthal)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心理学）在中国学术界得到复兴并重新引起重视。然而，各学科复兴的速度和与国际学术界、科学界整合的程度大相径庭。其中政治学发展尤其缓慢，这主要是因为该研究分散在各大学院系，与政治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分，而且该学科的一些主要研究范式属于中国国内政治的敏感内容（如政权更迭、民主化、民族冲突等）。本书的编者们了解这些问题，希望本书的中文版能够促进中国政治学者之间以及他们与国外的中国政治研究者的融合与交流。

本书专注于三个主要议题：如何有效地运用新的研究资料和数据收集方法；如何把中国政治研究更有效地整合到政治学的学科中；如何应对在中国做研究时所遇到的准备工作和伦理方面的问题。这些议题对于国内的中国政治研究者来说也至关重要，因为其中不仅涉及到处理数据和资料这类经常遇到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在创立能为更广泛的学科领域所接受并应用的理论时受到的挑战。而在中国研究中涉及的准备工作和伦理问题对于中国国内学者可能更为重要，因为他们必须时刻考虑其研究对消息提供者和研究对象造成的不利影响，还有在这个对社会科学研究结果并不开放的国内政治环境中对政策可能造成的影响。

诚然，本书主要是从海外学者的视角撰写的。作为比较政治学者，我们在英文版导言中提到本书中的很多建议和策略并不仅限于中国政治研究，而对更广泛的比较政治，尤其是在富有挑战性的环境中的研究都会有所裨益。我们认为，本书或许对中国国内专攻中国以外的政治和社会的“地区研究”专家的成长能有所帮助。例如，在第九章，贺斌讨论的次国家层面上的差异和比较可能对那些研究美国国内政治差异的学者有所启

发。芮杰明和陈鹏讨论的民族志和定性研究方法可能对那些致力于诠释其他社会的当地政治的学者有所帮助。

我们希望本书能促进目前中国境内和境外的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发展。特别希望通过对于这里提出的主题不断的交流和探讨，让它的影响逐渐超越国界，让我们共同追求中国政治学卓越的学术、研究和教学。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中文版，感谢多名译者不辞辛劳地翻译此书。在翻译过程中，他们查阅了很多相关资料。特别要感谢段若石先生为本书所做的校订工作，书中有一些对中国读者来说或许较为陌生的专有名词和概念。段先生认真地校订了本书每一章的译稿，以使行文更加流畅，更易于中国读者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赵梅博士为本书在中国出版做了很多中美间的协调工作，并进行全书统稿。由衷致谢！

（周晟茹译 赵梅校）

英文版导言^{*}

寇艾伦 (Allen Carlson) 高 敏 (Mary E. Gallagher)

墨 宁 (Melanie F. Manion)

2006年11月在密歇根大学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中，三代学者会聚一堂，探讨和论辩有关中国政治研究，以及全新多样的数据来源和方法是如何改变这个领域的话题。本书即是对此次研讨会的总结。借助于他们不同的研究经历，我们在书中为大家展现了在新时期研究中国政治中使用的各种数据来源、方法和实地考察策略。作为政治学家，我们的任务是在该学科框架中，为其设计和使用独特的方法，并指出在当代中国的研究过程中会遇到的具体挑战或机遇（或两者兼而有之）。本书重点谈论的是人们关心的研究方法以及新发现的数据来源，各章充分并翔实地阐述了如何创造性地、正确地在新的环境中运用这些方法。可以说，本书向人们展现了当前中国研究和更广阔的学科之间相互借鉴所带来的益处。

我们在研讨会上集中讨论了三个主题：第一，如何有效地使用新的信息来源和数据搜集方法；第二，如何把中国政治研究与政治学学科结合在一起，使两者相得益彰；第三，如何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处理好研究工作所遇到的准备工作和伦理问题。在本导言中，我们要围绕初次举办的研讨会，本书内容十分丰富的章节，以及中国研究领域，来探讨这三个主题。由于我们过去对中国政治研究缺乏系统的关注，我们谨希望以本书作为抛砖引玉，激励人们未来在复杂的实地考察设计方案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展开积极的争论，出版更多的刊物，举办会议以及研究生培训活动。我们认

* 编者要感谢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蒋经国基金会、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以及密歇根大学政治科学系的慷慨支持。

为本书的出版与目前正在进行的辩论不谋而合。^① 以下各章节还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政治研究领域发生的诸多变化，并不影响学者们运用他们在过去掌握的治学方法。不过我们深深感到，对于想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来说，掌握语言技能和对中国具备一定的了解程度是重要的前提条件。此外，我们的地方性知识，即对中国的了解，也日显不足。书中每位作者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展示了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这套范围广泛的研究政治的技能包括：使用复杂的定量手段获取和利用调查数据，应用新技术寻找和使用过去被封存的档案材料，甚至是进行非正规的实验。虽然这些方法采用了政治学研究中的诸多手段，展现了中国政治研究既令人印象深刻又时而不一致的发展趋势，但是本书的所有作者在使用各种方法的时候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提高他们描述和解读当代中国政治核心问题的能力。正因为如此，这本书体现了把各种背景的学者集合在一起的好处，他们共同的使命是本着一种兼容并包、共同提高的态度，来推动中国研究和该学科的发展。可以说，虽然本书谈论的都是中国大陆的事情，但是我们相信书中的方法和研究设计策略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学者不无裨益。

一 数据的处理是一种极大的丰富吗？

政治学领域里的中国研究在过去 30 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以多种形式反映了在中国政治中发生的事件和变革。曾几何时，中国与西方学术界“老死不相往来”，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几乎是孤军奋战，而新时期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令我们看到了一个奇迹，研究中国的政治学家终于渡过了资料和数据极度匮乏的困苦，迎来一个信息鼎盛的时代。^② 这种情况代表着近年来一种根本性的改变，学者们可以更多地接触到海量的涉及中国状况的资料，他们开始深入地了解中国。换句话说，虽然使用新方法值得称道，而且在本书中也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作者们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政治研究中使用更先进的社会科学研究手法，正是因为他们能够在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内容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涵盖了中

^① Baum, 2007; Harding, 1994; Heimer and Thgersen, 2006; Manion, 1994; Perry, 2007 and 1994b; Shambaugh, 1993; Wank, 1998.

^② 见 Baum (2007)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研究中国的历代政治学家的介绍。

国国内政治、对外关系以及国家安全等方面。

目前在中国政治研究中,数据的多样性、规模和复杂程度都在不断增加,这就需要学者们静下心来思考和讨论一番,看看如何能有效而正确地使用这些数据。新型的、更系统的数据常常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机遇,使他们不仅能够有效地使用这些数据,而且可以将这些丰富的数据与业已建立的数据来源相结合。它们不仅能使我们的论据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具有更高的可靠性,而且也可以帮助我们在涉及比较政治学和政治学的辩论中,有效地运用这些中国案例。本书很多章节专门阐述了使用多种方法和数据来源以达到上述目标的手段。其中李磊(Pierre Landry)借助全球定位系统(GPS)空间技术,应用统计抽样的新方法,向我们展示了法律传播的形式和改变民众对中国法律体系的观念的实际机制。史宗瀚(Victor Shih)、单伟(Wei Shan)和刘明兴(Mingxing Liu)推出了一个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新数据库,为系统分析中国核心政治精英提供了便利。戴茂功(Neil Diamant)和曦中(Xi Chen)谈到了中国档案中官方数据的价值,以及这些数据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性。

资料来源和数据的这些变化改变了我们对早期方法论和资料来源的解读和评估方法。几乎所有研究中国的学者都不愿再充当旧时的“克里姆林宫专家”,但是我们不能对过去一概否定,我们研究的一些内容仍要涉及并分析中国政治的一些自身的重要方面,尽管它们并不适合用现在的方法做系统研究。在这方面,人们首先会想到史宗瀚、单伟和刘明兴在第二章中对精英政治的分析,当然其他重要的社会现象,如群体暴力、贪污、逃税等,也是极为重要的和有必要进行研究的题目,我们绝不能因为研究数据匮乏而残缺不全,在有些政治形势下政府的公开压制,或者对信息提供者、地方官员和国内同事们屡试不爽的自我审查制度,就放弃研究工作。在书中,许多作者详尽说明了如何克服数据匮乏和不完整去完成重要的研究主题。曦中对“上游”和“下游”官方数据的分类方法为如何解读和评价政府关于中国群众抗争行动的报告和统计数据的可信度和精确度,提供了颇有裨益的手段。他还细致入微地论述了如何准确地判断政府对掌控公民群体活动提供的数据,以及加深对政府部门官僚结构和官僚政治的认识和了解的重要性。陈鹏(Calvin Chen)运用民族志方法对中国工厂的研究,使人们洞悉了中国东南沿海“世界车间”的阴暗一角。施达妮(Daniela Stockmann)在研究中利用了眼下在中国铺天盖地的新印刷

媒体资源。虽然中国报纸和电子媒体报道被一些人斥为官方宣传的翻版，然而施达妮向人们表明，利用 Yoshikoder^① 等新技术，就有可能在这些出版物中捕捉到大量有关当代中国政治趋势的新信息。寇艾伦（Allen Carlson）和段宏（Hong Duan）论述的是如何利用涉及中国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的网络资源，他们发现网络资源并不像最初设想的那么丰富多采，但它们却大有用武之地。

二 比较政治与比较中国

近几十年来，中国政治研究深受政治学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时下人们对正确方法的激烈辩论中，同时，人们重新将该领域研究纳入更宽泛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越来越多的政治学专业研究生院校的培训课要求具备坚实的方法论技能，这给研究中国政治的学生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而且，应用这些方法时必须对该领域具有透彻的认识，要能够考虑到中国不同的环境，比如它是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实行威权政体和具有亚洲文化等。因此在培养研究中国问题的研究生时要注意各种能力的均衡发展。掌握更多的方法（不论定性还是定量）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更不必说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培训。不言而喻，要想成功地研究中国政治，这两方面的技能都是必需的，也就是说得学会两条腿走路。这种与众不同的适应能力往往在课堂上是学不到的。

还有一点，近些年对特定地区的研究，尤其是对个别国家甚至对特定区域的研究，在政治学领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姑且不论这个现象是进步与否，人们所期待的是比较政治学，某些国际关系和安全问题研究，在进行任何实地调查时可以获得可资运用的理论和论点。当然最理想的是结果是开创适用性最广的理论，用它们来分析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变革现象，例如民主化、快速的经济增长、高效的公共产品供给，以及民族和陆与冲突。在全球大部分地区，比较政治研究都采用了传统的“地区研究”，专家们在研究某一国家或地区时不遗余力地向人们展示他们进行“跨国”研究的能力，他们热情可嘉，硕果累累。虽然跨国比较研究早已成为比较政治学的标志，但是随着人们获得的数据越来越完善，近年来实现了民主化的国家中可供人们分析的电子数据日益增加，以及计算机程序日益强

① 多语言内容分析工具，译者注。

大, 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也发生了改变。鉴于在研究生院校的培训中更加强调定量研究方法, 比较政治学研究越来越多地采用大样本数据集和复杂的统计分析来比较国家。出于不同的原因, 有时人们认为这些方法要比较案例研究或小样本比较研究更加有效和可靠 (不同见解见 Schrank, 2006)^①。

总的来说, 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还没有走上这条正轨, 或者说至少还是刚刚起步。有几个理由说明了为何中国研究还处在这个大趋势之外, 它们包括做相关对比研究的难度, 中国内部巨大的差异性, 以及难以为进行跨国比较研究找到或编制出高质量的数据。鉴于这些问题不单针对中国, 也时常在其他地区和国家中出现, 所以我们所讨论的这套改善中国比较研究的策略方法也适用于其他地区。

第一, 由于 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主义制度从东欧到中亚国家的彻底失败, 那些在早些时候经常被用来与中国比较的国家不是已经分离崩析, 便是改弦易辙, 进行了民主化改革, 或者兼而有之。尤其是苏联的寿终正寝使曾经活跃一时的比较共产主义研究领域变得无所适从。虽然中国、东欧、中欧和苏联之间的比较研究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90 年代甚至之后一段时间, 但是随着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发生明显的分野, 使得正确进行比较研究的工作愈加困难。由于当前跨地区和国家的许多研究都以民主选举和政党政治为基准, 而中国的一党体制以及基层以上缺乏竞争性选举, 这就使得它不具备与那些国家的可比性, 因而被排除在许多跨国研究之外。幸好一些情况下, 系统地获得的电子数据可以改变研究方向, 避免了那些使用此方法研究行不通的问题。正如李侃如 (Kenneth Lieberthal) 在结语中指出的那样, 我们研究问题应该是因为它们有意义和重要的关联性, 而不是仅仅因为它们可以从数据中找到答案。这种因数据无法与在发达民主国家获得的数据相比较而将重要问题, 甚至连带将一些国家排除在外的做法, 着实令人惋惜。在中国的案例中, 对于基层选举和其他层面上的半竞争性选举所做的定量和定性研究, 取得了重要的, 可以说是突破性的成果, 它使人们看到在中国社会举行的选举是怎么回事。然而, 因为在选举

① 对于正在进行的关于不同方法孰优孰劣的激烈辩论, 我们在此不便做出判定。虽然在过去二十几年里政治学越来越倚重定量方法, 但是定性方法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兴。这些定性方法包括比较案例研究、过程追踪、民族志等。这些方法在本书中都是讨论的重点。

问题上中国的数据仍然难以融入主流比较政治研究（这些数据大量来自于民主国家），中国的案例在该领域内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力。

因为中国并没有重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覆辙，即在走向结果各异的民主过渡之前，先经历经济上的然后是政治上的崩溃，所以中国到底能够恰当地与哪些国家进行比较还不得而知，特别是当跨国研究工作往往以政权类型对国家进行分类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中国在过去的25年中，其经济上取得的非凡成就使之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佼佼者。因此，人们通常将中国与过去的东亚近邻经济体，或者与当前的巴西、俄罗斯和印度（其他“金砖国家”）进行比较。然而在政治上，中国长期处于共产党一成不变的威权统治，这种异乎寻常的情况在理论和方法上给研究者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中国应该与哪些国家进行比较呢？我们应该如何在大规模的跨国研究中为中国的政权类型精确地定位呢？在大多数理论认为民主制度是以某种形式存在的政治常态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避免民主过渡的本体论目标^①？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审视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不是审视我们理想中的中国的情况？

第二，将中国作为单一实体的比较研究常常会忽略中国内部明显而长期存在的地区差异性。中国的总体统计数据虽然显示了其经济成就，快速降低的贫困率，从农村向城市的大量的人口迁移，以及城市化和工业化，但是这些数字掩盖了巨大且正在加剧的地区间不平等。中国沿海城市目前正在接近发达水平，居民的生活水平与其周边富裕的发达国家不相上下，而内陆地区仍然在与极度贫困、文盲和落后作殊死斗争。这种经济的多样性和差异影响到文化、语言和社会多样性，而在许多情况下，这种社会的多样性本身几乎就代表着世界各地国家之间的差异。贺斌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认为，应该鼓励比较政治学的学者进行比较研究，以便取得有意义的理论性的和实证性的成果。其实单就成果的丰富而言，次国家层面比较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不一定会比那些在学科中受到高度重视的跨国比较研究差多少。确实，本书的许多作者都利用中国内部丰富的多样性来验证自己的假设，或者探索政治学中一些理论的因果机制，以便搞清楚经济发展的性质，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转变，或者公民社会的发展。

最后一点，尽管中国数据的数量和质量在近些年中得到了长足的改

① 强调自身独特的民主，译者注。

善，但是要想获得高质量的数据仍十分困难，人们很难将它们与国际机构、国家政府部门、学术团体或商业公司在其他国家编写的数据进行比较。中国政府认为许多信息在政治上是敏感的，仍不愿意支持收集系统性数据的工作，它对于政治的定义理解更加宽泛。在某些情况下，政府会出于政治目的操纵数据，使人难以相信政府提供数字的准确性。其结果是许多研究者对来自中国的统计数据自然而然地抱有一种合乎情理的怀疑。所以，尽管有些数据在中国政治研究中极为重要，但是只有当我们搞清楚数据是如何产生的，它们是由于何种目的时，才可以在文章中使用它们。的确，正如曦中在关于中国档案中的官方数据一文中所说明的那样，追溯中国国内统计数据来源的工作能够大量揭示当代中国国家体制的运作方式。尽管中国在这方面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然而中国共产党对信息和组织机构的重视，可以转化为对调查研究和获取某些政府文件和档案材料的严格控制，以致于有些规定和法律都成了官方机密。这样的管制仍然在妨碍人们编写准确的数据集，它反过来不利于人们对中国进行比较研究。

虽然中国政治研究从总体上讲，还没有完全融入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科中，然而本书中的论文充分说明，致力于理论和方法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在中国进行研究的政治学家们的行为规范。接受了中国历史、文化和制度方面训练的学者们所使用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的标准方法，逐步地弥合了我们在导语中讨论的问题和中国政治研究领域，与该学科之间长期存在的隔阂。葛小伟（Peter Hays Gries）撰写的一章就是证明这一趋势的好例子。虽然他的研究工作扎根于对亚洲文化的近距离解读，但他也对所谓的政治文化有相当的了解。一般来讲，政治文化对东西方之间的差异做出的概括会有失偏颇。葛小伟并没有让这种难解的东西方分歧继续存在下去，他探索了近年来政治心理学领域的进展，然后以亚洲和美国为背景条件进行了一系列社会实验，以探明他的研究对象在“观察”世界时产生的区别到底有多大。他的研究结果之后被应用于设计一种更加可靠的框架，来分析领导人心理在亚洲安全领域问题上是如何影响国家间关系的（包括美国）。

三 在充满挑战环境中的政治研究

当政治学家进行的研究触及敏感话题，当他们要想使用新型和独特的数据采集方法，或者要想探讨会令强势的国内统治感到不安或不利的问

时,他们就会遇到中国长期实行的威权主义在工作条件、伦理和政治上造成的难题。正如在世界上其他许多地区一样,在中国研究政治问题仍困难重重,有时甚至是危险的,而且往往和政治活动脱不了干系。因此对这项工作来说,使用新数据来源和方法就显得格外有必要。除了取得的成就,我们在研讨会的讨论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到,需要更加坦率地讨论当实地考察工作在选择地点和题目遇到困难时应该采用的变通办法。虽然我们身为社会科学家要坚持工作方法的正当性,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但是我们每天遇到的情况需要我们有时要做出妥协。中国政治研究存在着风险毋庸置疑。那些努力想获得所谓“内部”的,涉及国家秘密的数据的研究者们,也许会陷入与中国政府为敌的境地。当研究者的工作逐步深入到中国政治敏感领域的时候(研究题目包括少数民族、民主化、宗教自由等),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而且,进行访谈、调查,为得到档案资料而与官员合作等等做法,都有可能连累到研究对象和同事。因此,虽然我们不想过分强调这些挑战,然而在中国工作的政治学家所面临的挑战已经不再是提高自己研究能力的问题,而是涉及伦理方面。

随着我们的研究途径和机会越来越多,在中国做研究的工作条件和伦理问题也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在中国对待外国人的问题上,外国学者目前可以从他们的接待单位那里得到更多的自主权,从总体上讲能够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从而为研究工作取得更加方便的工作环境,与大陆学者建立合作的新渠道,以及进行大规模研究项目的更便利的条件,比如抽样调查、档案研究和建立大型数据库。这种融合和更加频繁的合作要求对社会科学中的伦理问题给予额外的关注,比如对信息提供者的保护,对当地合作者的需求和顾虑的关照,在实地工作中某些不正规方法的使用等,以便不违背西方大学从伦理上对保护研究对象提出的要求。本书的一些章节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策略,来帮助那些研究敏感题目的人解决他们所遇到的问题。狄忠浦指出在与调查人员进行的基层合作中,当地合作者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当地的合作者和同事深谙如何提出研究题目才能减少政治敏感性,少受自我审查的限制,以及鼓励地方官员给予支持。芮杰明通过运用“深入实地方法”,在中国城市的基层组织中搜集信息并取得了进行“参与性观察”的经验,这些基层组织正是市民最频繁最密切地接触到的政府机构。芮杰明认为,如果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深入研究一些地区,我们就了解不到威权政权中隐性而微妙的各个方面。

四 线路图

在最近人们进行的中国政治研究中有一个令人振奋的进步，那就是在单独一项研究中利用不同的证据来源和多种研究方法。的确，我们在书中按照他们使用的主要方法的题目来编排各章，其中一些章节谈到的研究对多种研究方法做出了最详尽的阐述。我们希望本书能够进一步推动这方面的发展，促进学者们之间更富有成果的合作关系，使之在调查涉及中国政治的重要问题时能更充分地利用新数据来源、方法和实地考察策略。

第一部分各章重点谈中国政治研究的新数据来源，以第一、二章作为一组。在第一章中，曦中分析了利用信访档案（即投诉）资料的好处和缺陷，然后极其详细地描述了获得这种材料的方法，指出保管它们的单位，以及获得它们的难易程度，还提出了一系列策略使人们能够更便利地使用这些材料。曦中还更为深入地分析了中国档案数据的可靠性。

史宗瀚、单伟和刘明兴关注的是现在，他们把注意力放在研究精英政治上。史宗瀚等人说明他们是怎样投入更大精力去研究精英政治，并从中获益的。进一步说，他们建立了一套全面的中国领导人数据库，时间回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他们认为，从前的中国精英政治研究缺乏这样一种详尽的资料作为基础来研究中国领导人宦海沉浮的方法和原因。

第三至第五章把我们的关注点重新转向新数据来源何以能加深对中国政治的理解这个问题。在第三章，葛小伟从一种全新的方向来探索数据来源，他主要依靠实验方法和心理考量来研究中国外交政策。在这个过程中，他意欲推动人们超越从前不尽人意的研究，去探讨政治文化在中国与世界的新型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更确切地说，他首先提出了他在两个分别进行的心理学研究中的方法。接着，他借助这项工作，更广泛地讨论了在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的实验工作的挑战性和局限性，以及进行心理考量的尺度。在第四章，寇艾伦和段宏考察了与中国外交政策相关的网络活动的增长变化。他们认为研究者没有充分客观地了解这种发展趋势，以至于网络作用最后有可能在本领域内被夸大。他们没有去探讨在中国互联网空间中涉及外交事务和国家安全的革命性的发展，而是揭示了在这个领域中为数有限的几种新数据来源。虽然这些数据对学者们非常珍贵，但是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与众不同。第五章中，施达妮通过大规模的研究得到了略有不同的结论。她研究了大量的可以从网络上获得的中国新闻媒

体数据来源,并认为这些数据来源为学者们提供了新的机遇来进行跨媒体、跨区域和跨时间的内容分析。施达妮探讨了选择适量的样本对中国的报纸进行内容分析所存在的问题。凭借对沟通方法的深入了解,她对于在中国条件下对不同数量的报纸抽样进行内容分析取得的效果和效率进行了比较。虽然她关注的是抽样的数量规模,但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对报纸内容跨媒体、跨区域和跨时间的比较,施达妮也为抽样的框架结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第二部分重点放在中国政治研究中的定性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研究者得以重返该研究领域之后,多种类型的定性方法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研究的标志。虽然本书恪守这一传统,但是作者们已经超越了中国政治研究范畴,把眼光放到更广阔的学科中去,从而向人们表明,中国政治研究促进人们就一系列问题展开更广泛的辩论,比如在威权政权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本质(芮杰明)、在一种快速发展的经济中的协作型政治(陈鹏),以及失业上的比较政治经济(贺斌)等问题。

在第六章中,陈鹏(Calvin Chen)向人们展示了民族志是如何在了解当代中国政治中成为一种有效工具的。虽然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方法不足以解决问题,但是陈鹏表明民族志研究可以超越仅提供“深度描述”的界限,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那些引发、支持或阻碍变化的多种多样的,有时甚至是隐蔽的因素。通过在宏观水平上的专题研究,剖析社区和机关的发展,民族志作为一种方法,能够帮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宏观上的作用力是如何影响普通中国公民的生活和相互关系的,以及反过来它们是如何影响宏观作用力的。这种方法的确有助于理论的发展和提炼,它不仅仅是通过提供实证性的“事实核对”,而且还通过找出和评估在改革时期的中国,影响社会和政治的各种因素,而这正是我们要阐释清楚的。

在第七章中,芮杰明在此方法上高屋建瓴,他认为研究设计方案中应该包括“深入实地”研究。他用这套方法来研究中国城市居委会性质变化的问题,并结合使用民族志方法,虽然他的这种方法比单一案例的范围更宽泛,但还不属于大样本研究。芮杰明认为这种方法适用于政治学,因为它帮助研究者提出新假设,揭示因果机制,甚至可以证明现有著述中的假设是不真实的。他的论点取自于使用了这些方法的,范围更广的文献,这些著述名称不同,有些属于其他的领域,包括美国政治学。芮杰明还指出,在威权体制和一些政治不公开的文化背景中,这些